



东南亚研究名著译介系列之三

东南亚的经济

(日)北原淳
西口清胜
藤田和子
米仓昭夫
著

刘晓民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东南亚研究名著译介系列之三

东南亚的经济

(日)北原淳
西口清胜
藤田和子
米仓昭夫
著
刘晓民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的经济/(日)北原淳等著.(中)刘晓民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2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东南亚研究名著译介系列之三)

ISBN 7-5615-2172-3

I. 东… II. ①北…②刘… III. 经济-研究-东南亚 IV. F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356 号

责任编辑:王扬帆

封面设计:文 心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地址:三明市新市南路 166 号 邮编:365001)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218 千字 印数:1—1 200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1191713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庄国土

副主编:廖少廉 王 勤 聂德宁(常务)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勤	古小松	古鸿廷	包乐史
刘 宏	刘 稚	庄国土	李国梁
李金明	吴崇伯	余定邦	汪新生
张锡镇	陈福郎	林 梅	周 宁
周聿峨	段立生	侯真平	贺圣达
聂德宁	高伟浓	郭志超	黄良文
梁志明	蒋细定	曾华群	廖大珂
廖少廉	薛学了	戴可来	

中译文序

立命馆大学 西口清胜

这本《东南亚的经济》在日本出版的时间是2000年5月,而我们四位合著者所进行的有关东南亚经济的研究也是在此之前,更具体地说,是亚洲经济危机之前的时期。因此,首先想叙述一下亚洲经济危机后至今的东南亚经济的状况。

始于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的亚洲经济危机,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南亚各国,引起了货币贬值、股价下跌等连锁反应,同时将实现了甚至被称为“奇迹”的高度经济增长的这些国家推向了经济负增长的深渊。全球性短期资本的突然大量流出引发了危机,又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策(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失误,危机越发趋于严重。但是,以1998年后半期为最低点,1999年东南亚各国意外地出现了V字型的经济恢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为东南亚各国经济恢复契机的,是危机本身所带来的贸易收支的大幅度顺差。随着经济危机→经济收缩→进口骤减带来大幅度的贸易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债状况得到改善,各国经济也恢复了稳定。在货币稳定的背景下,东南亚各国开始有富余的时间去纠正以往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些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转换,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促进了经济的恢复。此外,国际经济环境也对东南亚经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出口部门成为了经济恢复的火车头。其中电子、电气产业的出口增长尤为显著,而支撑着这一出口增长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对信息技术机器需求的增加和东南亚区域内交易的恢复。区域内交易在危机时因需求减少成为加速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但在复兴时又

因需求增加对经济恢复作出了贡献。

1999年出现的V字型经济恢复,实际上并没有持续多久,2000年又直接受到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衰退的影响,对美出口减少了,随后,2001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再次出现了大幅度衰退倾向:新加坡陷入了一2.4%的负增长,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分别显示出0.5%和1.9%的低增长(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3, 2003)。东南亚各国试图通过金融缓和与积极的财政拨款来扩大国内需求,以此来防止经济衰退。2001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趋于恢复,对美出口开始增加,为此2002年上半年经济趋于上升,但下半年其所依赖的美国经济的恢复力逐渐减弱,因此对美出口依赖程度很高的东南亚经济便出现缓慢衰退的倾向,人们认为今后依然会出现不稳定、不透明的状态(The World Bank, *Making Progress in Uncertain Times: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Overview*, November 2002)。

如上所述,亚洲经济危机后的东南亚经济,经历了短暂的恢复和衰退这种眼花缭乱的变化,与保持着“奇迹”般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的时期形成了对照。东南亚经济不能恢复到稳定的增长轨道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后,其内部产生了“三种债务”,即“政府的债务”(财政赤字)、“企业部门的过剩债务”及“金融部门的债务”(不良债权),因此只不过是脆弱的基础上的恢复(The World Bank, *East Asia: Recovery and Beyond*, 2000)。对外经济因素,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低迷状态和日本经济萧条,也促使有可能持续下去的经济增长处于困难的状态。

以上就是亚洲经济危机后至今的东南亚经济的状况。根据这种情况,鉴于本文具有“中译文序”的性质,这里拟对以下两个问题,即东亚的地区主义(Regionalism)势力增强的问题和产业空洞化问题稍加详细的论述。

首先叙述第一个问题。关于东亚地区主义势力增强的背景,可以先列举来自亚洲经济危机的教训。由于因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

组织的对策失误和对美国的姿态[对面向亚洲的资金提供采取不合作态度,并反对亚洲货币基金(AMF)设想]产生的不信任感,东亚各国已认识到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必要性。1997年底召开了第一届“东盟+3(日中韩)”首脑会议,其后每年都将区域内经济合作作为主要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由于对体现全球性的世贸组织的多边协议的不满(难以达成灵活的谈判和协议)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Free Trade Agreement)签署的加速化过程中东亚的落后和焦急情绪等[直到最近,除了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东亚并未达成任何FTA],东亚开始积极地探讨地区主义的问题。

在日本,走在前面的是经济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日本经团联”)。日本经团联提议“积极推进FTA——朝着通商政策的新进展”(2000年7月18日)。在认识到“FTA对各国来说是与世贸组织同样重要的通商政策的支柱之一,国际性通商体系已经进入了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共存的新时代”的情况下,要求日本政府“也有必要将FTA作为通商政策的新的支柱积极地加以利用”。日本经团联列举了以下4点作为应该推进FTA的理由:(1)成为扩大与对象国和地区之间商业机会的重要工具;(2)有必要消除在欧美各国致力于签订FTA时,因没有签订FTA所导致的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的情况;(3)通过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与对象国之间的规章制度的协调,促进日本国内的结构改革,例如取消或放宽各种限制、消除高成本因素等;(4)在拥有许多加盟国的世贸组织,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及规章制度的制定很不容易,因此有必要以地区水平对此加以补充。似乎受到这些经济界的要求的促进,日本政府大大改变了战后的通商政策。战后日本的通商政策,迄今一贯采取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主义,但在21世纪初期已转变为多边主义和利用FTA的地区主义这两者并用的战略性通商政策。经济产业省扮演了领导角色。该省判断,“随着世贸组织的谈判灵活性的减弱及各国的战略性FTA的签署这两个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化”，已不能仅依靠世贸组织，同时认为“世界性 FTA 签署的动向并非否定了世界性的自由化，也不是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卷土重来。不如说 FTA 具有这样一种互补的作用，即：世贸组织的多边主义和 FTA 的地区主义相互刺激，从而使世界性贸易自由化得以促进”（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2001 年版）。

这样，在 21 世纪初期日本的地区主义问题受到关注时，中国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一直探讨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前述的“东盟+3”第五届首脑会议（2001 年 11 月在文莱召开）上，中国与东盟各国达成了在 10 年之内成立 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的协议。在第四届“东盟+3”首脑会议（2000 年 11 月在新加坡召开）上，朱镕基总理（当时）向东盟首脑建议签署 CAFTA，但东盟方面表示有困难。但是，中国向东盟各国提出了富有魅力的建议，从而取得了东盟的同意，并在第六届“东盟+3”首脑会议（2002 年 11 月在金边召开）上正式签订了 CAFTA 的框架协议。中国的攻势与 FTA 的快速签署是令人注目的。中国向东盟提出了这些富有魅力的建议：（1）优先实施东盟各国感兴趣的农产品和新鲜食品等 8 个领域的自由化（“早期收获”方案）；（2）对东盟内的先发国家（东盟 6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和后发国家（印度支那 4 国：柬埔寨、缅甸、老挝及越南）加以区分，对后者给予最惠国待遇，同时将 FTA 的实现日期推迟到 2015 年，给予了实际上的关照；（3）取消印度支那 3 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累积债务，加强经济援助；（4）在与东盟之间搁置至今的悬案——南沙群岛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约定不行使武力并维持现状；等等。据观察，其目的在于：（1）在东亚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尤其是在 FTA 上掌握主导权；（2）对付近年来高涨的“中国威胁论”。

进而，中国在第六届“东盟+3”首脑会议上也向日本和韩国建议签署日中韩 FTA。日本认为时机尚早，采取了慎重的姿态，而韩国虽然支持合作研究，但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这样，在东亚的

FTA 问题上,中国主导的态势更加明显,日本在落在后面的同时,不得不制定反击的战略。

日本对东亚 FTA(FTA 系指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而 EPA 在可以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相互认可、纠纷处理、人才培养等广泛的领域的自由化这一点上与 FTA 是不同的,但人们一般从广义上称之为 FTA)战略的开端是 2002 年 1 月 13 日与新加坡之间签订的“日本、新加坡经济合作协定”(JSEPA: Japan-Singapor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成功地签订了 JSEPA 的小泉首相于 2003 年 1 月 14 日发表了“小泉学说”,其目的显然是与 CAFTA 抗衡。日本也与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各国签订 FTA(在第六届“东盟+3”首脑会议上,日本迟中国一年成功地与东盟各国之间达成了在 10 年内实现包括 FTA 在内的“综合经济合作设想”)。

制定日本与东亚 FTA 战略的是外务省。外务省发表了“日本的 FTA 战略”(2002 年 10 月),其特征是确定了“FTA 的战略性优先顺序”。就优先顺序来看,首先是东亚,其次是在日本的企业比在欧美各国的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的墨西哥。即:(1)提出在东亚“应该首先追求与韩国及东盟的 FTA,在此基础上,中长期致力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的 FTA”,并阐明针对中国以及 2003 年 5 月与新加坡签订了 FTA、进而又接近其他东盟各国的美国,在东亚的 FTA 谈判中要取得主导权的意图;(2)在东亚和墨西哥以外,智利不是紧迫的重要课题,俄罗斯、南非、非洲等就更不值得重视了。此外还认识到,关于与北美和欧盟的 FTA,因为现实上存在着农产品交易等相当困难的课题,因此还不可以作为当前的课题。关于将东亚列在“FTA 的战略性优先顺序”的首位,外务省与经济界(日本经团联)的认识是一致的。日本经团联发表了“朝着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日本”的设想(通称“奥田设想”,2003 年 1 月 1 日),在其第三章“加强东亚的合作,向全球性的竞争挑战”中设想,将“东亚自由贸易圈”(EAFTA: 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作为日本 FTA 的具体对象,最迟在 2020 年前后予以实现。

以上叙述了中国和日本对东亚 FTA 的意图和战略。那么,东南亚各国如何应付这种情况? EAFTA 有没有可能实现? 下面拟叙述一下这一方面的问题。

正如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尤其是 FTA1997 年以后每年都由东盟主持的、邀请东北亚 3 国(日中韩)参加的会议——“东盟+3”首脑会议——这个主要舞台上加以讨论所反映的那样,东盟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很大。其理由之一是,东盟各国的目标是克服 AFTA 的局限(东盟区域内交易比率为 25% 以下,仍然很低,加盟国之间竞争关系强于互补关系),将 AFTA 扩大到东亚,实现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一体化。设想通过引进并利用东北亚 3 国的经济活力,具体地说,是通过促进从这 3 国引进直接投资(FDI:外国直接投资)并防止 FDI 从东盟流向中国,扩大东亚区域内交易来取得经济发展,这是经济规模和产业、技术基础等远远比不上东北亚 3 国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集团——东盟应付全球化时代的地区主义战略。第二个理由是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显著发展的中国的战略。由于中国的兴起,“中国威胁论”在东盟各国扩散开来。因为东盟各国和中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结构上都比较相似,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方面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来自中国的骤增的出口商品不仅会流入东盟各国的国内市场,而且在第三国市场(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等)也会取代东盟各国的商品。而且,东盟担心在其面向出口型工业化政策(EOI)中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 FDI 会从东盟各国流向中国。在 FDI 方面,东盟各国和中国也处于竞争关系。如此看来,东盟各国的“中国威胁论”并非没有根据。

但是,中国的兴起不仅是威胁,另一方面也会提供机会。东盟各国同意签订 CAFTA 的背景有以下这些:(1)防止 FDI 向中国转移;(2)同时有参与发展扩大的中国市场的强烈意图。可以认为中国方面巧妙地接受了东盟各国的这一意图,其结果开始了 CAFTA。第三个理由是与日本的关系。第一,虽然同意签署 CAFTA,但东盟各国期待日本起到平衡器的作用。即,FTA 不是片面地倾向中国,而

是与日本也保持着关系,取得平衡。东盟各国在第六届“东盟+3”首脑会议上同意实现“日本、东盟综合经济合作设想”的背景即是如此。第二,毋庸置疑,从贸易、投资、援助等几乎所有指标来看,东盟各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远比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要紧密而长久。出于这些原因,东盟各国在东亚 FTA 的设想和谈判上将“东盟+3”的框架置于最现实而重要的地位。

但是,“东盟+3”的框架与 EAFTA 实际上是一致的。那么,EAFTA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EAFTA 系由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日本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日中韩关系这 3 个国际关系组成。(1)如前所述,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设在东盟秘书处内的专家组的报告书(*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ASEAN-China Expert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October 2001,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作出了乐观的展望。的确,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有了急剧的增加。1991 年的贸易额仅为 79 亿美元,而 2000 年已达到 395 亿美元,以年率 20.4% 的高速度增长着。中国向东盟各国的出口从 1991 年的 41 亿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173 亿美元,而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从 38 亿美元增至 222 亿美元,贸易结构也从原料和粮食等初级产品为主转移到制造品,实现了高级化和高附加价值化,今后的贸易增长也大有希望。以上这些都成为了该报告书的重要依据。但是,从在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来看,东盟各国在中国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仅从 1991 年的 5.7% 增至 2000 年的 6.9%,进口比重也仅从 6.0% 增至 2000 年的 9.9%。另一方面,中国在东盟各国(东盟 6 国)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仅从 1993 年的 2.2% 增加到 2000 年的 3.1%,进口比重也仅从 1.9% 增加到 5.2%。直到现在,双方之间的贸易比率仍不足 10%,这反映了双方的竞争关系比互补关系更强,估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竞争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考虑到双方的这种关系,虽然 CAFTA 意外顺利地开始了实施,但日本甚

至出现了这样的见解：“对 CAFTA 的政治疑虑先行于其实现的可能性。CAFTA 将成为什么样的形态仍难以作出预测。中国的 FTA 谈判，是在拥有无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的情况下，朱镕基总理一再勉强进行的”（小寺彰：“中国新体制的展望——受到追究的贸易规则的遵守”，见《日本经济新闻》，2003 年 2 月 25 日），CAFTA 的前景未必总是乐观的。（2）就日本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来看，与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竞争关系相反，日本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中互补的因素的确比较多。以 2001 年 1 月与新加坡的 FTA(JSEPA)为开端，2003 年对日本来说是要正式进行 FTA 谈判的一年，也是不仅与墨西哥和韩国，还要与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接连进行 FTA 谈判，在东亚的 FTA 谈判中赶超中国和美国的一年。但是，正如媒体所报道的“日本对亚洲各国关于与日本签订 FTA 的要求却抱着消极态度。其理由是国内的农业领域的调整没有进展”（社论：“小泉首相为什么不行动”，见《朝日新闻》，2003 年 6 月 2 日），其前途并不明朗。（3）如前所述，对日中韩的 FTA，日本是消极的，韩国也持保留态度。在日中和中韩的 FTA 谈判中，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将会成为很大的障碍。甚至在这种障碍较小的日韩 FTA 谈判中，虽然日本为了在东亚的 FTA 谈判中与中国和美国对抗并取得主导权，强烈希望尽早实现与韩国的 FTA，但由于韩国担心对日贸易逆差扩大（2002 年韩国的对日出口为 151 亿美元，而从日本的进口为 299 亿美元，韩国陷入 148 亿美元的大幅度逆差。在日本对韩国的平均关税率为 3%，韩国对日本的平均关税率为 8% 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种逆差状态，因此预计如果签订 FTA、实现相互关税为零的话，韩国的对日贸易逆差将会增加 60 亿美元左右），还未能进入政府间的正式谈判。韩国总统卢武铉在 2003 年 6 月访问日本时，表明要推进东北亚的地区经济合作，并设想了“欧盟似的东北亚共同体”。

从上述探讨来看，认为早日实现 EAFTA 的可能性很小是比较安全的。尽管有人积极提出了设立欧盟型的地区合作机构——亚洲

同盟(AU: Asian Union),但不能不说在最近的将来,其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第一是建立地区合作机构所不可欠缺的加盟国之间的相互信赖问题。在形成前身欧共体后进一步发展成欧盟的背景中,有着像被称为“德法轴心”那样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作为深刻的教训、以两国为中心宣誓反战、建立了相互信赖关系的长期的历史过程。东亚设想组的报告书(*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A Report submitted by East Asian Vision Group, December 2002*),仿效欧盟提出了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设想。但是,在东亚,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问题”经过战后近60年仍没有得到解决,日本与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仍然很缺乏或者处于不充分的状态。这样的话,欧盟型地区合作机构是难以实现的。第二,与欧盟和NAFTA不同,东亚的地区主义还有不得不开放成为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的兴起,东亚的区域内交易比率一直在提高,但实际上中国对东亚来说,与其说是最终消费地和需求地,不如说是对美出口基地。这样,东亚区域内交易的增长和对美交易的扩大便同时进行。即:美国市场对东亚来说仍然是必需的。同时,东亚的中国、东盟或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都采取了以引进欧美各国的FDI为前提的EOI战略。这样看来,市场、资本或技术、经营技术均较高程度地依赖区域外的地区,是难以建成自立的地区合作机构的,即使EAFTA得以实现,也很可能仅是相当松散的——这才是开放的地区主义所意味的组织——地区合作机构。

下面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和产业空洞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对日本经济来说,是甚至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极为萧条的10年。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恢复的兆头,日本的企业仍然在严峻的经营环境中继续摸索着。

这里有一份关于日本企业所考虑的“目前国内外事业中最优先

课题”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2001年底拥有1家生产据点、拥有3家以上海外当地法人的812家日本制造业企业。调查票的回收期是2002年7月至8月,得到508家公司的回答,有效回答率为62.6%)。实施调查的是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开发研究所[“关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事业展开的调查报告——2002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第14次)”,《开发金融研究所报》,第14期,2003年1月]。根据该问卷调查,最优先课题的首位是进一步扩大海外生产(54.6%),第2位是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独自的交易对象(37.8%),第3位是集团经营的重组和提高效率(事业出售、事业分离等)(32.5%),第4位是根据总成本对国内生产体制的重组(25.4%),等等。

从这个问卷调查可以知道,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需求不足、价格趋降,日本企业在激烈的企业间竞争中,必须(1)降低成本;(2)将获取海外市场作为主要课题。为了降低成本,力图进行国内生产体制的重组,通过对海外的投资来加强成本竞争力。这样,作为获取海外市场和低成本生产基地最合适的对象,中国便浮出水面。对中期(今后3年期间)海外经营活动,表示加强、扩大的占79.6%,表示维持现状的占20.0%,表示缩小、撤退的占0.4%。从这些回答也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对海外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作为中期海外事业开展地区,依次为中国(70.1%),北美(50.4%),中欧、东欧(46.8%),东盟4国(44.2%),欧盟(43.3%),亚洲NIES(30.9%),其中中国占最大比重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日本企业把中国作为中期开展海外事业的理想国家的原因来看,第1位是未来市场的成长性(86.3%),第2位是廉价劳动力(68.9%),第3位是廉价的原料零部件(30.3%),第4位是面向组装厂家的供给基地(28.7%),第5位是对日出口基地(26.8%),第6位是第三国出口基地(25.2%)等,可以知道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目的显然是:(1)获得中国市场;(2)降低成本;(3)以中国生产趋于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北京中关村等地为背景,作为供给基地加以利用;(4)作为出口基地加以利

用,等等。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兴起相当显著,作为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成长动力”是FDI,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便给人以日本企业的对中国投资引起日本的产业空洞化的强烈印象。到底这种理解是否正确?下面拟加以探讨。

首先有必要对产业空洞化下定义。根据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调查部编的“围绕我国产业空洞化的诸问题——考虑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与回答”(该调查部《调查报告》,第41期,2002年8月),所谓的产业空洞化系指“通过直接投资,产业部门转移到海外,为此国内的制造业部门便趋于缩小、脆弱”(关于这一定义是否妥当拟在后文叙述)。产业的空洞化引起了就业机会的减少、技术水平的降低、贸易收支的恶化等,对国内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该《调查报告》还叙述道,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未必总是引起产业空洞化,通过创设新的产业、使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机会和技术水平都会得到维持和改善,贸易收支顺差也有可能保持下去。但是,目前日本的产业空洞化,由于中国的兴起所致的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的不断扩大,正在造成以下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1)制造业的事业所(工厂)正以空前的速度减少;(2)成为“受资对象”的新产业的创设和对日投资没有进展;(3)这些问题与日本的经济结构问题密切相关;(4)支撑着日本制造业发展的分工网络等的“产品制造基础”有可能趋于脆弱并丧失等。以上便是主要的见解。

其次,该《调查报告》就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对策进行了探讨。对策的中心是谋求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即通过开拓新产品和新领域来创设新的产业。为此,列举了:(1)产学协作;(2)放宽限制及自由化;(3)促进对日投资;(4)针对企业的税制和金融环境的改善;(5)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不仅是该《调查报告》,总的说来,日本具有强烈的向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产业空洞化经验学习的倾向。其经典是“扬报告”(1985年)。1983年,里根总统设立了以当时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总经理J. A. 扬为委员长的“产业竞争力委员会”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该委员会于 1985 年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书,“世界性竞争:新的现实(Global Competition: The New Reality)”就是《扬报告》的正式名称。例如,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产业技术部《〈扬报告〉以后的美国竞争力政策和对我国制造业空洞化的启示——为改善国际竞争力基础和加强技术革新的建议》(该产业技术部《产业报告》,No. 3,2001 年 12 月),“的确,如果现在不总结出‘日本版的《扬报告》’并将其付诸实施,很有可能会出现空洞化问题等无可挽回的事态”。抱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时,便最重视“成为关键的技术革新”和新产业的创设问题了。

以上叙述了日本对中国投资和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及其对策的概况。以下拟相对地谈谈我们的见解。首先来探讨一下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动向和规模(投资额)。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呈大规模状态并迅速增加的看法是错误而没有根据的。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以 1995 年度的 4 319 亿日元为顶点,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便逐年减少,1999 年度为 838 亿日元,降到了只有高峰期五分之一的水平。到了 2000 年度,总算转而趋于增加,2000 年度为 1 099 亿日元、2001 年度达到了 1 802 亿日元,但其投资额并不大(根据日本财务省“对外及对内直接投资状况”各年度版,下同)。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日本对亚洲投资的中心是亚洲 NIES 和东盟各国,在这一点上,与世界对亚洲投资趋于从 NIES 和东盟各国向对中国投资倾斜形成了对照。到了 2000 年以后,由于对 NIES 和东盟各国的投资趋于减少,在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有了若干增加。但就 2001 年度的情况看,日本对亚洲投资的合计额为 7 730 亿日元,其中中国为 1 802 亿日元(23%)、亚洲 NIES 为 4 474 亿日元(58%)、东盟各国为 2 944 亿日元(38%),中国的比重不及对整个亚洲投资的四分之一。1995 年度至 2001 年度,日本对亚洲投资的累计额为 7.582 万亿日元,其中中国为 1.4687 万亿日元(21%)、亚洲 NIES 为 2.4557 万亿日元(35%)、东盟各国为 2.9231 万亿日元

(39%),可见中国在日本对亚洲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仅约五分之一。

这里拟从日本财务省编的“对外及对内直接投资状况”各年度版中再引用一份有关日本 FDI 的统计资料。过去 10 年间(1992 年度至 2001 年度),日本的 FDI 总累积额为 51.8323 万亿日元。从最高额的 1999 年度的 7.4390 万亿日元到最低额的 2001 年的 3.9548 万亿日元,投资额虽然因年度而异,但年平均约达 5 万亿日元。而日本的 GDP 增长率由于“失去的 10 年”而停滞不前,现在约为 500 万亿日元。因此 FDI 对 GDP 比约为 1%。如前所述,对亚洲投资在日本的 FDI 中所占的比重,在这段期间年平均约为八分之一,而对中国的投资在整体亚洲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五分之一。因此,日本对中国投资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是 1%的四十分之一(0.025%)。由此可知日本 GDP 的 0.025%投到中国,引起了日本产业空洞化的主张是多么可笑。即使承认在国内特定的地区和产业或行业中有忽视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所带来的冲击,也应该说有关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和产业空洞化的决定性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认为,日本企业因中国的兴起而进行的对中国投资并不是引起产业空洞化的主要原因,产业空洞化的根本原因在日本国内。如前所述,日本经济苦于长期萧条和需求不足,处于价格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萧条”中。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的,是小泉的“结构改革”路线,尤其是打着加速处理不良债权的旗号,于去年 11 月采取的“竹中金融再生计划”。根据日本政府(内阁府)于 2003 年 5 月 16 日发表的 2002 年度 GDP 统计数字,日本的 GDP 连续两年陷入负增长,为 499.4 万亿日元。1994 年度以来隔了 8 年又跌破了 500 万亿日元大关。在通货紧缩引起的萧条中,民间需求(个人消费和民间设备投资)的急剧减少妨碍了经济的恢复,美国的经济衰退造成的出口减少又加剧了这种情况(《日本经济新闻》,2003 年 5 月 16 日)。如果个人消费不增加,价格下降不阻止,企业就不能实现销售额的增加(增收),从而进行不了设备投资。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日本的企业以“减产、增加利润”为目标,加强了企业重组。这样便陷入了企业重